



激进民主

Radical Democracy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Douglas Lummis) / 著
刘元琪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Karl Marx

激进民主

Radical Democracy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Douglas Lummis) / 著

刘元琪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进民主/(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著; 刘元琪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23-6

I. ①激… II. ①道…②刘… III. ①民主-研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391 号

“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激进民主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 译

Jijin Minz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1.2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5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題。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为《激进民主》中文版写序。我也很想知道今天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这本书。当我写作时，我心中最初设定的对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读者。很自然，这本书是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为背景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也就是说，它既被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影响，也被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产生的幻灭感影响。

激进民主力图表达的是一个特殊的美国问题（称呼它是一个“美国问题”，我并不是意指它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办法将它的问题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一般的民众和社会科学家，对于民主真实意义的理解很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民主的本义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可以帮助人民赢得和拥有这种权力。由于很多这样的制度（宪政、由法律确立的人权和定期选举等）在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美国人就易于将“民主”等同于他们自己那一套政治制度。于是，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还是反抗国家权力的人们之理想的民主就演化成为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人被教导成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投票选举这个或那个政党来轮流统治这一超级大国（或被这一超级大国统治），并支持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外的“保护民主的战争”。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被这样教育——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就是自由市场，以至于任何通过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方式来矫正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做法都被看作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的。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人们很难理解到经济体系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权力体

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人们比如工人被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所统治。

这本书（像我在第一章中所写）呼吁“正名”。我从孔夫子那里借来这一术语，虽然孔夫子的原意与此大为不同。这本书呼吁回归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力上去。我们应将这个词从那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手中夺回，将它归还给人民。我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作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是应看作“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工厂民主化的问题，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工人们都努力斗争以求解决，但是在 21 世纪它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

为实现正名，本书往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深处挖掘，以唤醒人们，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一个理想。本书指出，定义为人民权力的民主不是一个新的思想，而是恢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本来是面向西方的。我能肯定中国读者将在这本书中发现很多不适用于他们状况的内容。提出要注意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可能不利于说服那些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人。如果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理解的某位能够为中国读者写作一本和本书意图类似的著作，它肯定和这本书不一样。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书可以写出来，也许已经有这样的书了。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取得权力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制度，那么这种理念的根本精神肯定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就像没有任何有机体自己去寻求疾病一样，没有任何民族会去寻求衰弱、压迫、剥削和堕落。如果这是我的一种倾向，那么就让它吧：这正是我的信仰。同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肯定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传统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本书主张马克思的解放哲学的伦理基础是民主（像马克思年轻时候所公开表达的一样）。资本主义发展的缺陷是，它剥削和压迫工人并产生不平等，也就是说，它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它结束剥削和压迫并给工人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将使经济领域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是手段，而民主是目的。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只是通向目的的一种设计。如果它不能带来所期望的目的，这绝对不会使民主本身失去可信度。它只是意味着必须寻求别的方式。

如果这种主张被接受，那么也许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到，民主不是美国政府利用禁运等压力方式从外部强加给中国的“美国体系”，而是中国人民在过去 100 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历尽巨大的、痛苦的和英勇的斗争而力求达到的重要价值。

本书认为，马克思从未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发展道路”。正是列宁在掌握政权后，在发现苏维埃国家的工业革命还是一片空白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这种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很根本的）。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这种解释的读者也能够发现，我这样做是在力图回到马克思的伦理观的根本上去。而且，这本书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很清楚地把握到“压迫的意志”和“剥削的意志”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物化进机器和生产结构之中。这便利了恩格斯、列宁和以后的理论家这样主张：工厂中自由的缺乏不可避免，工人对它的反抗是错误的。我相信，对机器的神秘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工业机器并不简单是既可以用于好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的中性工具。机器已经嵌入了深刻影响操作机器的工人的伦理选择（例如效率）。这意味着，工人民主化这一历史任务（工人的解放）必须包括“机器”的“去神秘化”和“去物化”。如果关于机器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它也适用于作为今天中国工业化基础的机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发现这本书的有些内容和他们今天的情境还是有关系的。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和编辑《激进民主》中文版的朋友，特别要感谢刘元琪，他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

道格拉斯·拉米斯

致 谢

这本书第一稿的大部分写于 1987—1988 年我离开津田塾大学度年假期间。我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在菲律宾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度过了半年时间。感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以及当时的主任伦道夫·S·大卫 (Randolf S. David)，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访问学者的资格，而且给我提供了最难得的优待——在图书馆可以有一张桌子。在那段时间中，我不仅和伦道夫·S·大卫，还和该中心副主任辛西娅·鲍蒂斯塔 (Cynthia Bautista)，以及 P. B. 阿宾内尔斯 (P. B. Abinales)、亚历山大·马格罗 (Alexander Magno)，还有该中心别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我还有很好的机会能和萨尔瓦多·卡洛斯 (Salvador Carlos) 一起教一门政治理论课程，并在和他的对话中受益良多。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也发起了三次讲演，在这过程中我拿出了本书前三章的第一稿，而且我收到了对这些讲演稿的生动的、有思想的批评。我要特别感谢雷诺多·拉卡萨 (Reynoldo Racasa)，他不但租给我们一个房间，而且从他的餐桌上我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有关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知识。

1988 年下半年，我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变迁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对于这一决定我要感谢该研究所及其主任特洛伊·达斯特 (Troy Duster)。该研究所发起的一次讲演上，我得以拿出第二章的第二稿。在那段时间中，R·杰弗里·勒斯蒂格 (R. Jeffrey Lustig) 让我们住在他在伯克利后院的小屋中，他阅读我的稿子，提出富有帮助的批评。多谢杰弗里！

下一个我必须提到的团体要指认明白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没有名字。这是一个界定相当模糊的研究团体，其成员只是不定时地碰面，最初是由伊凡·伊里奇 (Ivan Illich) 组织的。在 1988 年和 1989 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1990 年于得克萨斯的豪斯顿，我有幸加入这个团体。这些会议的结

果是《发展词典：作为权力的知识的指南》（*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ed. Wolfgang Sachs, London: Zed Books, 1992）。我给那本书撰写的内容（“平等”，38~52页）和本书第二章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我非常受益于那些会议上的对话。我要特别感谢的不仅仅有伊里奇和萨克斯（Sachs），而且有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巴巴拉·杜登（Barbara Duden）、古斯塔沃·埃斯蒂法（Gustavo Esteva）、阿什斯·南蒂（Ashis Nandy）、马奇德·拉赫利玛（Majid Rahnema）、琼·罗伯特（Jean Robert）和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

影响这本书的另一实际经历是我参加了对1989年夏季在日本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规划（这些会议被称为“为21世纪的人民计划”），特别是参与了一年之久的讨论——这些讨论后来形成《水俣宣言》。我特别要感谢我在亚太资源中心的同事武藤一羊（Muto Ichiyo），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受民族国家限制的民主或解放理论，至少在历史上的此时是一个贫乏的理论。

而且，在津田塾大学和我的同事三浦永光（Miura Nagamitsu）共同教一门课程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们共同设计的这个课程是关于进步理论的批判历史的。

下述一些人细致地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有见地的批评：除了勒斯蒂格之外，还有弗兰克·巴达克（Frank Bardacke）、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约翰·沙尔（John Schaar）和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鼓励可以说是我的精神食粮。我要特别感谢杰弗里·伊萨卡（Jeffrey Isaac）——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外审读员，他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设性的建议。我在“导言”中也表示了对马洛·肯瑞（Muro Kenji）、鹤见俊介（Tsurumi Shunsuke）和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的感谢。

我衷心地感谢藤原淳子（Narahara Junko）和山香淳子（Yamaga Junko）做的录入工作。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基思·拉米斯（Keith Lummis），他给了我很多，其中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本书的题词：

“你不必精明，你所有要做的是停下来，思考。”

通常，一个男作家致谢最坏的时刻在最后到来——当他感谢有耐心的妻子时。这里，我感谢我的妻子——斋藤靖子（Saito Yasuko），不是为了其耐心而是为了她没有耐心。她以这样一种方式帮助我继续我的计划：她偶然问：“什么？你还在忙那件事情？”

你也许会想：有这些帮助，这本书将比原来的手稿好得多。如果事实与此不符，读者知道该责怪谁。

这本书的萌芽是我的文章《民主的激进主义》，它发表在《民主》杂志第2卷第4期（1982年秋季号）。这篇文章也以日文发表于《日本的激进宪法》（Tokyo: Shobunsha, 1987）一书中。第二章最初以《反对民主的发展》为题发表在《替代：社会转化和人的治理》第16卷第1期（1991年冬季号）。第五章曾被收入为庆贺伊凡·伊里奇的60岁生日而编的《朋友书，纪念册》一书中。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允许我用这些材料。

道格拉斯·拉米斯

目 录

导 言	激进民主	1
第一章	激进民主	6
第二章	反民主的发展	38
第三章	反民主的机器	73
第四章	民主有缺陷的传统	104
第五章	民主美德	134
结 论	普西芬尼回归	150
译后记		155

导 言

激进民主

在 1980 年的某个时候，我的朋友马洛·肯瑞在和他的指导教师兼朋友——一位名为鹤见俊介的哲学家谈过话后，顺访了我，他兴致很高（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他说，“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激进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批判性的：在美国，在苏联，在日本，在菲律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所有地方。”这个既老又新、既简单又复杂、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的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当看到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原则——据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讲，这个原则只值得欢呼两下，但绝不值得欢呼三下——如此兴致勃勃，我是感到很好奇的。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有人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说，有一本名为《民主》的杂志，并询问我在日本是否有激进民主主义者可以举荐为这本杂志撰稿。^[1]“激进民主”这个观念开始植入我的脑海。这种经验有点像你开始爱上邻家的一位姑娘（或小伙），那种感觉你一直知道但突然变得那样新鲜、那样鲜明、那样……史无前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在日本，我一直是某种类型的运动积极分子，但像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道槛，我未跨过，只是一直借重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批判力量。在那些年代的运动政治学中，马克思主义被解释为和民主左翼有一定的距离，即是说比民主左翼要激进；在另一方面，民主主义者被解释为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地位上（并很难和后者区分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一中一右这样的空间性的隐喻对于安置我们政治学的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量。一个人的政治定位如果是被认为在另外的两种政治倾向之间，这种定位很难避免被想象为是一种妥协、杂糅，并且没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原则。我开始感觉到鹤见-马洛的定律（“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能够成为重